



周易老子新证

序

宋祚胤

坤生潜心于《易》、《老》、《庄》者有年，严格遵循以《易》、《老》、《庄》治《易》、《老》、《庄》之原则，凡众说揆之于《易》、《老》、《庄》而合者则取之，其不合者则去之。其独抒己见而前无古人者，亦必考之于《易》、《老》、《庄》而犁然有当，始笔之于书也。坤生自此远矣！近得所著《〈周易〉〈老子〉新证》，乃益知余言之非阿其所好也。

自古迄今，治《周易》而聚讼不休者莫过于成书时代以及书之为何而作，其以为作于西周初年而用为占筮者，殆同然一辞也。然取履卦六三“武人为于大君”观之，则不徒周初无此事，即整个西周亦惟《竹书纪年》之“伯和篡位立”能当之，是《周易》已涉及西周末年之厉王矣。再取《周易》及《国语》复按之，则《周易》不言阴阳，而阴阳实始见于周宣王大臣虢文公之“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是《周易》不能成于宣王之时，其必出于厉王之季年矣。其实《周易》即为厉王复国而作，其书言王者十六次，言大人者十二次，言大君者三次，言相当于大人之君子者多次，而提挈全书之乾卦复喻之以龙，咸足

以证明《周易》必为西周之王而作。而厉王以前无“武人为于大君”，宣王之时始有阴阳，则《周易》非为厉王而作不可也。或谓厉王昏暴，宁能见许于《周易》之作者，此特未细读《周易》耳！井卦九三“王明，并受其福”，是《周易》作者已深知厉王不明，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是《周易》作者已深知厉王渺小不识大体。其所以犹拳拳于厉王者，徒西周宗社黍离之忧耳，其爱国之心不足以为矜式邪？至于以《周易》为占筮，实滥觞于《左传》。然验之以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则《周易》作者不信占筮之本证也。且占筮必变卦，而《周易》无片语只字及变卦，则《周易》不能为占筮之书也。以上两事如不能正确解决，则治《易》无从谈起。而坤生此书则既已持之以故，言之成理，而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以处理之矣，其必长悬于天壤之间而耿耿不磨，可逆睹也。

《周易》最重孚，尤以训为诚者为甚。诚者真实而不虚妄，即所谓无妄也。人而有孚焉，必“行有尚”（坎卦卦辞），必“元吉”（井卦上六），无往而不可。《尚书·洛诰》“作周，孚先”，已审知振兴西周之必有待于孚矣。《周易》于孚而反复致意焉，亦期之于厉王恃之以中兴耳。然人而无妄，其贵何如，则《周易》之孚又不仅有助于厉王之复国而已也。

循环论首创于《周易》，所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卦卦辞）者是也。《周易》为此说，其目的在于说明西周王朝复兴之为必然，而厉王复国亦理之所必有，于乾卦而见之矣。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以群龙之始卒若环，自“亢龙”而“潜龙”，而“飞龙”，以明乎厉王亦必远离乎穷亢，而夭矫于云天也。

《周易》作者深知武人强大，厉王弱小，欲斥去武人，必用柔而不用刚，用弱而不用强，亦即以退为进，以后取先，始能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也。此义常见于各卦，而以小过为最集中、最突出，其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咸斯义也。

孚也，循环也，柔胜刚，弱胜强也，诚《周易》之三要义，而坤生之书咸醺醺焉味乎其言之矣。

老子之道出于《周易》，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其明证也。道首创于《周易》，然至老子而始大，“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则《周易》犹未及此也。以天地万物之出于道，入于道，遂循环而不穷，“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则循环又统一于道矣。抑《周易》之循环，特一物之自为其循环耳，而老子之循环，则矛盾相为倚伏之循环，其去辩证法乃益近矣。至于“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其源于《周易》更彰彰明甚。而“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亦小过九四“勿用，永贞”之发展也。是老子之学，其挹取于《周易》者甚多，而另辟门庭，遂卓然大家，而坤生之书咸三致意焉矣。

老子欲“以道佐人主”（《老子》第三十章），庄子欲“正而后行”（《应帝王》），意皆在淑世，非颓然自放者也。而“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大宗师》），宁“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上九）者邪？特“当今之世，仅免刑焉”（《人间世》），始“洸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矣。是老子庄子咸有得于《周易》致君泽民之意，吾将待坤生之发之也。一九九二年七月序。

自序

这本《〈周易〉〈老子〉新证》系在笔者近几年来于高校所开设的理论选修课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就研究这两部典籍而言，此书之价值或许可从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两方面来体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言中对学术活动曾有精辟的见解，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反对空言泛论，主张“学有宗旨”。“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之要领也”。所谓“学有宗旨”，依笔者的理解，即是通过平时积与渐的功夫，对研究对象逐渐从理解而消化而成为自己的东西，再经抽象而形成理论，并且以简略的语言表而出之。所以黄氏认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否则，“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笔者在本书中以“中行”（中道）贯之的三种理论概括《周易》六十四卦的内容，以“心物不二”表达老子理论的本质，就是有意识地在这方面所作的一种尝试性的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梳理前人（包括今人）理论的过程中，凡引用其观点者，曾注意尽量予以说明。但观点往往是熔铸而成，难以举说清楚。记得笔者在

《“以老解老”与“心物不二”》论文中，曾指出老子乃强调“道用”而非强调“道体”，所以以“心”或“物”来概括老子道的本质，都欠妥当。论文发表后，方读到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谈道家在作用层上表现本体的言论，惭愧之余，深觉自己的孤陋寡闻。所以本书也注意吸收海外新儒家有关的通明高妙的见解。理论的达成当然与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这里笔者想就研究方法谈点自己的认识。

方法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间唯一有意义的联系方式。真正的方法，必然是不仅关涉到被研究的对象，而且与研究者的自身的思想与素质也是攸然难分的。中国文化的研究，现在虽然是品门繁多，但归结到最后，只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就研究者与对象的主客观两方面来说，进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实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中国哲学，说到底，是立在生命价值的追求上，所以就研究者主观条件而言，对生命没有一定的体验是很难深透下去的。譬如，中国学术的形成，中国古人以教与学所体现的学术活动，其首要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授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化民成俗”。如何能做到“化民成俗”呢？这就要求为学者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而且经过知识的提炼，落实在实践上，首先应是一个有精神感召力的人，“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所以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以上《礼记·学记》）也是基于这种学术精神，孔子因而提出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这既是夫子面对“周文疲敝”，学者生命堕落而发出的慨叹，也是一个如何评价为学者的标准。所谓“为己”，是说为学者所进行的学术活动，首先是为了充

实他自己，提高他自己的学养和生命境界。所谓“为人”，是学问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只是为了外在的名利。学术上“为人”的成分太多，追求真理的热情（学术良心）就会逐渐冷漠，如此就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问。这种状况，用孟子的话来说，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告子上》）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命运虽可以说是反反复复，但总的情况是厄运不断，到“文化大革命”几已完全被斩断根脉了，如果从研究方法上找原因，它之所以不断地受到粗暴的对待和僵化的处理，与为学者主观上过分地看重利害，以致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处于“疏离”的状态恐怕是分不开的。

从客观材料方面看，研究中国思想史较之于研究西方思想史，显然面临着更为困难的任务。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一般来说有着明显的中心与主题，使用明确的概念，结构严密逻辑性强，使读者易于把握。而中国古代先哲们，他们著书立说首先是基于内外生活的体验，所以其思想是随处显发，论点往往分散多处，他们所用的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往往蕴藏着不同的内涵，使后人很难把握。譬如老子用“无”字，五千言中用了六十四个“无”，此外，还有“无为”、“无以为”、“无物”、“无极”等等，这其中自然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和内涵，不能笼统对待；弄清这许多层次和老子思想的转折，确实不是易事。至于《周易》借用占筮的形式，以卦象与文字之综合来表达思想，此为典籍中的特例，理解当然更为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史的理论价值并非是不可认识的。徐复观先生对此曾有很好的解释，他说：

“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

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体验经过了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常会淘汰其冲突矛盾的成份，而显出一种合于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者的任务。”

（《中国思想史论集·代序》）

徐先生所谓两种真理一致点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即是任何“理论真理”毕竟植根于“事实真理”之上，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理论的价值得以显发的根本原因。记得“五四”时期曾有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战，当时中国文化的思想价值几乎遭到全盘的否定，这是实证主义嘲笑哲学的典型事例。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嘲笑的本身似已显得有点可笑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文化中的思想价值终于逐渐得到了显发与肯定，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如此，弘扬民族文化现在依然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层面，很显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若没有在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弘扬民族文化就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难以想象，如果只是一口咬定老子是奴隶主思想家，其思想只是图谋复辟与开历史倒车，老子哲学的理论价值却能够达到充分的显发。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生命所系。但是，兹事体大，笔者能力有限，难以透彻言之，所能回应的，只是在本书中所作的尝试性的努力。至于这种努力，能否显现出《周易》、《老子》这两部典籍中潜伏着的结构，

传释出其理论的内容与思想价值，唯有留待读者去评判和接受历史的检验了。

余生也晚，“文革”十年，正当自己求学时期，当时劳动之余读点书，似在黑暗中摸索。一九七九年求学湖南，在宋师祚胤先生帐下侍读先秦典籍，虽顽昧不灵，胡天胡帝，但受宋师严格训练三年，方得以稍稍窥视中国学术之门径，此书得以完成，亦多有宋师之心血，古人有言：“不有先觉，孰开我人。”愿借此机会，表达弟子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刘坤生

识于汕头大学不秋草斋

一九九二年六月

目 录

上篇 周 易

第一章 论《周易》的研究方法……………(2)

第一节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周易》的构成……………(2)

第二节 《左传》《国语》的研究方法……………(4)

第三节 《周易大传》(《十翼》)的研究方法……………(9)

第四节 王弼《周易注》的研究方法及其影响……………(23)

第五节 现代学者的研究方法……………(36)

第六节 研读《周易》的正确方法……………(48)

第二章 论《周易》的思想内容……………(54)

第一节 作者的政治观点与成书的年代……………(54)

第二节 乾卦所包含的三种思想端绪以及与坤卦的 关系……………(65)

第三节 论《周易》中的天道循环思想……………(83)

第四节 论《周易》中弃刚取柔的实践方式……………(99)

第五节 论《周易》中以“孚”为代表的理性内省精神 (115)

第六节 论《周易》的影响·····	(145)
-------------------	-------

——流溉千古的源头活水

下篇 老 子

第一章 有关老子其人其书问题的澄清·····	(164)
------------------------	-------

第一节 从先秦资料看老子其人其书的基本事实··	(166)
-------------------------	-------

一、诸子的文章·····	(167)
--------------	-------

二、《战国策》的引语·····	(171)
-----------------	-------

三、儒家典籍的记载·····	(173)
----------------	-------

第二节 《史记·老子列传》的重新疏释·····	(177)
-------------------------	-------

一、几点说明·····	(177)
-------------	-------

二、“疑者传疑”的传统·····	(180)
------------------	-------

三、正文的解析·····	(181)
--------------	-------

第二章 观点的检讨与正确的研究方法·····	(189)
------------------------	-------

第一节 庄周与老子·····	(191)
----------------	-------

一、庄子对老子的评价·····	(191)
-----------------	-------

二、从《逍遥游》看道的存在的必要性·····	(195)
------------------------	-------

三、庄子的双重系统理论所反映的道的品格·····	(203)
--------------------------	-------

四、道在现实中的价值体现·····	(215)
-------------------	-------

五、结论·····	(221)
-----------	-------

第二节 韩非与老子·····	(222)
----------------	-------

第三节 王弼与老子·····	(231)
----------------	-------

一、玄学与王弼·····	(231)
二、会通孔老的问题·····	(235)
三、王弼“迹本论”启迪之一：有与无的问题·····	(238)
四、王弼“迹本论”启迪之二：从无为到无·····	(241)
第四节 从现代释义学探讨研究老子的正确方法·····	(247)
——兼评冯友兰先生两本《哲学史》中有关 老子思想的论述	
一、贝蒂的释义学四原则和古代哲学的解释方法	(248)
二、简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有关老子思想的论述·····	(253)
第三章 论老子哲学理论的架构和内容·····	(272)
第一节 老子哲学的产生·····	(272)
第二节 “双轨回向”的动态架构·····	(279)
一、理论的动力和追求·····	(279)
二、“道体”与“道用”·····	(281)
三、“双轨回向”的动态理论架构·····	(289)
第三节 “心物不二”的理论内容·····	(295)
一、无为与自然——境界和形态·····	(295)
二、天地与圣人——道与现象界的中介·····	(304)
三、致虚与守静——“心物不二”的追求·····	(310)
四、“弃智”与“绝学”——理性直观的认识方式·····	(320)
五、理论中的“三宝”——批判哲学中的肯定性 概念·····	(330)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336)

上篇 周 易

本篇的重点是想解决《周易》的思想内容与理论体系的问题，由此方可衡定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因为要探究其内容，自然就引出了研究方法的问题。自古迄今，围绕《周易》的研究，之所以形成治丝愈纷繁杂不堪的局面，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研究方法上出了问题。所以，本篇单列《论周易的研究方法》一章。今日看来，研究《周易》的正确方法应从何而来呢？首先，我们依然只能从研究《周易》的两千多年历史的积淀中，披沙拣金，继承先贤们的研究成果；其次，当代的学者对《周易》研究有重大的突破，这也包括了在研究方法方面。在探讨的过程中，《周易》六十四卦是检验方法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合之则取之，不合则舍之；再次，前人和当代学者没有触及到的，笔者不揣谫陋，出以自家机杼，去接受历史的检验。袁子才说过：“不取亦取，虽师勿师。”^①这种甘苦，笔者确实尝到了。

① 袁枚：《续诗品三十三首·尚识》。

第一章 论《周易》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周易》的构成

《周易》一书由六十四卦组成，每卦由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组成。从研究方法上而言，方法的正确首先是体现在周延性上。如果研究的方法只是扣住一个卦的某一部分，没有扣住其全部内容，对于这个卦的解释就难免要出现错误。更深一层说，由于六十四卦都是由八个基本卦两两重叠而成，在每个卦的内部，形成了上下卦的关系。凡研究方法不符合这种构成原则的，可能就是研究者己意的添加与发挥。而对《周易》一书理论体系的观点，只能是在正确地解释每个卦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凡是游离于本经内容之外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只能算作是“易学”的内容，而非《周易》本经的内容。即使是“曾经圣人手”^①也应予以破除。《周易》从第一次见载于典籍（《左传·庄公廿二年》）至今已是一千六百多年了，这期间因方法的歧异而形成繁杂的“易学”难以指数，探本溯源，对历史上的研究方法，唯有以本经内容加以衡量和取舍，或

^① 韩愈：《荐士》诗。

可由此而得出正确的研究方法。

《周易》卦象基本构成单位是“—”与“--”。“—”表阳性，“--”表阴性(实际上指刚柔两性，见后述)。这两种符号原始意义究竟是指什么，说法不一，但这与《周易》一书本身内容并无根本性的关涉，因为虽然它们是构成六十四卦卦象的基本符号，然而六十四卦是由八个基本卦重叠而来，并非由“—”“--”这两种符号直接组合而成。

《周易》由抽象的卦象和逻辑的文字两部分所组成。一般而言，应该是逐渐完成的，是先有象而后有辞。“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后有辞，辞著而后有变。”(明·陆樾《周易集解》序)。自古人们认为八卦是古帝王伏羲所画，这一点无多大争议(见《系辞下传》)。把八卦组合排列成六十四卦，那就歧说纷纭了。郑玄说是神农重卦，孙盛说是夏禹重卦，《淮南子要略》和王弼等认为伏羲重六十四卦，此类皆是无稽之言，不足凭信。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认为周文王重卦。

司马迁说：“文王……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又说：“自伏羲氏作《易》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班固说“文王……重《易》六爻。”(《汉书·艺文志》)班、马之说，也未提出足够的证据。看来，《周易》的作者目前是无法考证清楚的了。但以上几种提法，它们在关涉到《周易》的构成上有一个共同点，可以给我们后来者在研究《周易》的方法上以很大的启迪，那就是：《周易》卦象的构成最初是由每卦三个爻的八个基本卦再重叠而成每卦六个爻的六十四卦。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盛行两千多年的“象数说”的

研究方法，就是立足于“一”或“--”在卦中的位置和阴阳性质的变化。其前提实质上就是认为这两种符号直接组成了六十四卦卦象。“象数说”强调爻的位置和阴阳性质，从而违反了《周易》卦的构成原则。《周易》作者用三个爻组成一个卦，得出八个基本卦。八卦最初的象征意义正如《说卦》所说：

乾(☰)为天。 坤(☷)为地。

震(☳)为雷。 巽(☴)为风。

坎(☵)为水。 离(☲)为火。

艮(☶)为山。 兑(☱)为泽。

这八个卦象是最基本的象征之物，由此两两重叠，在两个基本卦之间，呈现出绚烂多姿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是《周易》卦象基本的构成情况。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必须受到卦象与卦爻辞的检验，看看它是否符合卦象组成的基本情况和卦爻辞文字的内容。

第二节 《左传》《国语》的研究方法

《左传》《国语》中的研究方法，代表了春秋时期研究《周易》的方法。杨树达先生作《周易古义》，把两书中谈论《周易》的记载都编入书中，给研究者以很大的便利。另据宋祚胤先生统计，《左传》引用《周易》廿处，《国语》引用《周易》共三处^①。高亨先生统计一共是二十二处，并在《周易杂论》中逐条进行了文字上的疏解。从引用的情况看来，大致可分为两

^① 宋祚胤：《周易新论》五五页。

类：占筮与论事。《左传》中用于占筮的有十四处，论事的有六处；《国语》中引用的三处，全部用于占筮。概括地说，春秋时代见于典籍的研究《周易》的方法，主要是用于占筮。在《左传》十四处占筮中，有十一处是通过变卦；《国语》的三处中有两处是通过变卦。所以，具体地说，通过变卦去占筮才是春秋时期主要的研究方法。所谓变卦，其方法就是通过一个卦的某一爻或几个爻，从阳爻变为阴爻，或者从阴爻变为阳爻，这样由于原先爻的性质变了，自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卦。这在《左传》、《国语》中通常称为“遇”什么卦，“之”什么卦。如“遇观之否”，即观卦(䷓)通过六四的阴爻(--)变为阳爻(—)，形成了否卦(䷋)，这样就完成了变卦。《左传》《国语》中以变卦而利用《周易》进行占筮，解释方法在形式上复杂纷纭，无理性可言；在解释者的思想上，是高下在心，任意发挥。变卦有变一个爻的，有变三个爻的，还有变五个爻的。先看因论事变一个爻的：

《左传·宣公六年》：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问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王子伯廖以《周易》丰卦变为离卦，来认定郑公子曼满由于“无德而贪”，必然要身遭横祸。丰卦变为离卦，实际上是丰卦上六阴爻变为阳爻而成为离卦。丰卦上六爻辞说：“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丰，大。丰其屋，使动用法，使屋丰，把屋子修得很大。蔀，草席。阒，静。意谓：房子虽大，但如同用草席遮盖严实，从门户窥视，